

# 《淮南子》儒家思想地位再衡估

## ——以《泰族训》为中心

王效峰

(咸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淮南子》对于先秦儒家思想的态度存在着可称为“前倨而后恭”式的变化。《泰族训》篇中儒家思想虽然集中突出,但在“经纬治道”问题上,却并不存在道家思想“在儒道边际思想上的脱胎换骨”,归向于儒家思想的“总结”,而是以“平流竞进”、两存其美的方式平调儒道,以求实现两者的理论融通。这一潜在的艰难承转,也凸显出《淮南子》思想上所存在的内在冲突。

**关键词:**《淮南子》;儒家;《泰族训》;道家;再衡估

**中图分类号:**B23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9)06-0021-05

《淮南子·要略》虽自夸《淮南子》之撰“非循一迹之路(不)守一隅之指”,但和《淮南子》所祖述的其他诸子相比,《淮南子》对于先秦道家,却最是心仪。《淮南子》接受史上,有一个共识,即《淮南子》内容固然显得“芜杂”,但其“芜杂”表象之下,却取道家思想为“血脉”,用道家之“道”来条贯它所涉及各个论域:一应言说,皆“考验乎老、庄之术”。这应和《淮南子》诞生于尚清静无为的文、景之世有关。

### 一、“前倨而后恭”:《淮南子》对儒学态度的变化

东汉高诱,在《淮南解叙》中首发《淮南子》的思想品格“近老归道”之论“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sup>①</sup>历代学人如王夫之、梁启超、胡适、刘文典等在《淮南子》“近老归道”的认识上,递相祖述高诱,可证高诱之言不虚。

但高诱又说,《淮南子》之撰,视域宏阔“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并补充道,《淮南子》的作者之中,有“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儒生以守护六经、践仁履义为志业。“诸儒”参与淮南著述,必然要引经据典,给《淮南子》输入儒家思想,从而使“旨近老子”的《淮南子》,呈现出“兼采儒、道”的风致。

“仁义”是儒学的基干。“总统仁义”也确乎是《淮南子》的思想主题之一。但是通读《淮南子》,可以发现其对儒学的态度,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前倨而后恭”的有趣变化。大体上说,《繆称训》以前诸篇,追随道家,排斥仁义。蔑称儒、墨之学乃是“博学以疑(拟)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而“失其大宗大本”<sup>[1]198</sup>，“不知原心反本”的“衰世湊学”<sup>[1]790</sup>。即便在最慷慨的时候,也只是宽宏地称许以“仁义”为基干的儒学,至多是有局部“救败”之末用,“而非通治之至也”<sup>[1]820</sup>。这种态度,可称为“前倨”。《繆称训》之后的《淮南子》诸篇则态度渐变,立场有移,时不时地用些动听的话语,向儒学及儒宗孔子奉上一瓣心香。到《泰族训》,竟一反此前一直坚持的

收稿日期:2019-07-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9YJA751038);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Z090)

作者简介:王效峰(1977—),男,陕西韩城人,文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高诱《淮南鸿烈解叙》。见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按:关于《淮南子》贯穿的思想,道家说之外,又有杂家说。本文从“道家说”。主“道家说”者,又有老庄道家、黄老道家、“新道家”说等等不同的说法。本文对《淮南子》祖述的“道家”的具体归属,不做过多讨论。

“道、德乃治国之大本”之说,改称“仁义”为治国之“大本”。这种态度,可称为是“后恭”<sup>①</sup>。

《淮南子》对儒学的这种“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变化,反映出汉家朝廷在意识形态、文化精神上由“贵尚黄老”向“独尊儒术”的转型,也使得《淮南子》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及儒道关系成为可资研究的问题

## 二、《泰族训》思想主题再剖析

《淮南子》正文,以《原道训》始,以《泰族训》终。《原道训》所“原”之“道”,纯是道家之道。《泰族训》则被认为是《淮南子》中儒家思想表现最突出的一篇。徐复观先生以为《泰族训》是《淮南子》全书的总结“但写这一总结的人,却落在—位或—位以上的了不起的儒生手上,使全书中的老庄思想,在儒道两家的边际思想上脱胎换骨,都归结到儒家思想方面;而所谓‘穷道德之意’的道德,不是以虚无虚静为体的道德,却成为以仁义为体的道德。”结论是,《泰族训》是“由儒家所作的全书的总结”。“道家思想,应归结于儒家思想之上。”<sup>[2]164</sup>此说对《淮南子》“旨近老子……归之于道”的古今共识是一个颠覆,不仅和《泰族训》古今注家的理解迥然有别,也和淮南《要略》的自述不甚相合。因为此说涉及对《泰族训》思想主题的理解,涉及对《淮南子》思想真相的判断,故而,对此说宜有剖判。

关于《泰族训》的思想主题,许慎的注释说:“泰言古今之道,万物之指,族于一理,明其所谓也,故曰‘泰族’”<sup>[1]2036</sup>。许慎虽然说《泰族训》的主题,是申“古今之道,族(簇,聚)于一理,明其所谓”。但许慎并未明言《泰族训》所“族”之“理”,就是儒家之道。未明言,说明许慎心中无此意念<sup>②</sup>。曾国藩云“族,聚也,群道众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sup>[1]2036</sup>曾国藩虽然说《泰族训》的主题,是引“群道众妙”向一个中心汇聚(“聚萃”)。至于“聚萃”于何处,却并未明言。

关于《泰族训》的主题,《要略》中说: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契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著凝天地,发起

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sup>[1]2129</sup>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凡《淮南子》自认为是“得意之笔”之处,《淮南子》总是用极尽华彩的笔触,恣意铺陈,自吟自赏。然而,汰去华言,究其本心,《要略》所言《泰族训》的主题,还是不难把握的。《要略》明言,《泰族训》的主题,乃在“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于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所归之“本”,就是治国理民之“治道”。治国理民的“大本”,在“德形于内”。《要略》还进一步说,“此《鸿烈》之‘泰族’也”,即这不仅是《泰族训》的主题,同时也是《淮南子》一切言说的汇聚中心。回过头来再看许慎、曾国藩对《泰族训》主题的理解,虽然未明言“明其所谓”所谓者何,“聚之又聚”聚于何处,但无异已得《要略》之“心”。可见徐复观先生之说恐有“强制阐释”之嫌,其“无形中表示,道家思想,应归结于儒家思想之上”<sup>[2]164</sup>的结论,既经不起逻辑推敲,又缺乏事实依据。

从逻辑上来讲,据《要略》“《泰族》者……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于一本,以经纬治道……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所说,《泰族训》的主题乃在引古今之道、伦理之序、万方之指总归于“治道”,而“德形于内,治之大本”。然而,“治”道至广,儒家有儒家之“治”道,道家有道家之“治”道,“德”有多方,儒家的“仁义”是“德”,道家的“为‘无为’,守道真,不妄作”也是

<sup>①</sup>有意思的是,在《淮南子》接受史上,对《淮南子》与儒学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前倨而后恭”式的有趣变化。迄于1930年代的《淮南子》接受者,多是欣赏《淮南子》汪濊的文笔、博富的知识,以及《淮南子》“考验乎老庄之术”的雅致;对于《淮南子》“总统仁义”那部分内容,持“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或有或无,都无伤大体的立场。即便是关心儒学的人士如扬雄、黄震等,对于《淮南子》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或哀其“乍出乍入”之“杂”,或怒其“不知体要”之陋,对《淮南子》“总统仁义”那部分内容,也不屑一顾。自1960年代开始,《淮南子》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日受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有《淮南》思想“归于儒家”之说。这同样有趣的“前倨而后恭”式的变化,或与1960年代开始的“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事实,以及台湾学者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有关。

<sup>②</sup>如果许慎心中真有“古今之道聚于儒家”的话,肯定会明白说出来。因为许慎是个笃诚的儒生,如果有能给儒家争门面、添光彩的事,应不会隐而不言。

“德”。“德”和“治”道,都是大范畴,儒家之“德”、道家之“德”,儒家“礼乐刑政”之“治”道、道家“为‘无为’”之“治”道,都是大范畴里的一个小科目。从逻辑上说,大范畴能容涵小科目,小科目不能吞并大范畴。仅从“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推不出“德”必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治”必是儒家的“礼乐刑政”之治。要断《泰族训》里的“治”为何治、“德”为何德,还得到《泰族训》的言说事实中去具体考察。

以内容看,《泰族训》可能出自儒生之手,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只是《泰族训》全部言说里所占分量不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为见《泰族训》的思想真相,需要细细梳理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分《泰族训》为十六段,让我们逐段分疏。

第一段引“万物有以相连,精稊有以相荡”的“天道”,归于顺天施政、“诚”能格天的“治”道。“万物有以相连,精稊有以相通”是阴阳家的思想。虽然日后为董仲舒所吸收,但本色不改。“顺天”是道家“为‘无为’”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虽然讲过“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也”,但那是讲修身的。当然,儒家讲“修齐治平”,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密切相关;但“诚能格天”不在孟子“诚之者人道也”之中。倒是在汉儒想象中的“明堂”之制——如《礼记·月令》所述中,有“顺天施政”之旨。而“明堂”之制中的“顺天施政”,带有明显的刻意“仿自然”之气。从“矫揉做作”这一点上说,“明堂”之制中所谓的“顺天施政”,恰是《泰族训》里明确反对的“德不内形,专用制度”。

第二段引“人巧不敌天工”,归于“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的“治”道。“大人者”云云,取自《易传·乾文言》。唯字句有小异,“与鬼神合灵”原文作“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四时合信”原文作“与四时合其序”;原文中“与四时合其序”在“与鬼神合其吉凶”之前。儒家的为政之道,也讲“执中含和”,例如《尚书》里被后世唐宋“新儒家”奉为尧舜相传之十六字“心法”里,就有“允执厥中”。儒家的“允执厥中”,虽然是尧舜传下来的“心法”,但“允执厥中”却不是从“人巧不敌天工”中推出来的,而是从“天工,人其代之”那里滋生出来的。“人巧不敌天工”是道家信守的观念。儒家坚持的观念恰好与此相反,

是“天工,人其代之”。

第三段引“天道无为而万物化”,归于“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能动化”的“治”道。“天道无为而万物化”“养心”,是道家信守的观念。儒家如孟子讲“求放心”,庄子才讲“养心”。儒家之“天道”,虽然有其“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的一面,但主流观念却是“天有生生之仁”。儒家信守的“天道”,有意志,有目的,并不是“无为”,而是“有为”的。《论语》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即是明证。

第四段引“因其性则天下听从”,归于礼乐以“劝善”、刑罚以“禁奸”的“治”道。“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是道家观念。儒家例如荀子思想中虽然有礼乐以劝善、刑罚以禁奸,但目的是为了“化性起伪”。而“化性起伪”,恰好是反“因其性则天下听从”之道而用之。

第五段从“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引出“制礼乐,行仁义”为“治之纪纲”。儒家色彩很浓,且带有孟子之“案往旧造说”气。其中,“制礼乐行仁义”是儒家坚持的为治之道。但“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谓之参”则明显掺杂有儒外之杂说。

第六段从“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引出“事穷则更为,法弊则改制”之治道。以“极则反,盈则损”为“天地之道”,是道家的观念。“事穷则更为,法弊则改制”是法家的观念。儒家信守的观念,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第七段引“天不一时,地不利,人不一事”,归于“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多方”、随机应变的为治之道。“绪业多端”——“三皇异治,五帝殊政”是法家惯用的说辞。克就《淮南子》的言说界域之内说,本书第三章已有分析。“绪业多端”——“三皇异治,五帝殊政”,是从淮南历史观——“衰世”论中滋生出来的。而淮南“衰世”论,不过是道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观念的“历史”化。儒家虽然也讲“守经执权”,但儒家的“治道”有其一以贯之、不“异”不“殊”的“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

第八段从“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

苛”中,引出“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的为治之道。孔子虽然有“苛政猛于虎”之说,儒家也有轻徭薄赋、勿夺农时的政纲,但在“约功、省事、寡求”上叫得最响的,是道家。从《泰族训》“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看,倡“约功、省事、寡求”,乃是为了对治为政繁苛的秦政。事实是,汉家是以“贵尚黄老”对治为政繁苛的秦政的。《淮南子·要略》里明确地说过,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发现儒家“齐之以礼乐”的治道“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这才“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烦扰”则不可能“约功”,“靡财”肯定反“寡求”,“害事”则不仅不“省事”,反而“生事”。

第九段从“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引出“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孔子有“齐之以礼乐/齐之以刑政”之说,相当于“太上养化,其次正法”。但孔子之“齐之以礼乐/齐之以刑政”,却不是从“养身”之道中推出来的。从“养身”之道推“治国”之理,是道家的手段。

第十段从夏、商兴亡经验中,引出尚“贤”下“法”、尚“礼”下“刑”的治道。这两条,是儒家的为政方针。尽管墨家也明标“尚贤”,但墨家“尚贤”的对应物,是“亲亲尊尊”,而不是“下法”。

第十一段从“舜放弟,周公杀兄”,引出“以仁义为准绳”的为政之是非的判断标准。“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是孟子倡导的为政原则。

第十二段据历史经验,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最有儒门风规。

第十三段从形骸上的“耳聋目瘖”,说到精神上的“心塞”:从登高才能望远,说到“为学”才能入圣。自是荀子思致。

第十四段提出为治“仁义为本,法度为末”。合乎儒规。

第十五段言“察始终,原本末”乃治道之要。儒家的为治之道有“本末”:仁义礼乐为“本”,刑政法度为“末”;有“始终”:“富之”为始,“教之”为终。但此段盖未述及,却奢谈“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契卷而信衰,知机械而空(许慎注:空,质也)衰”“福祸依伏”,而这一连串话语,纯是道家腔口。奢谈“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纯是法家腔口。

第十六段言“仁、知”乃是为政之柄。而“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自是儒门方规。

逐段分疏显示,《泰族训》共十六段,其中第五、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等七个段落,显述儒家思想。其余九个段落,则是聚萃“群道众妙”。这完全符合《淮南子》“不循一迹,不守一隅”的总体范例。

《泰族训》共十六段。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等六个段落,显述儒家之治道。那么,存在不存在徐先生所谓的《泰族训》要让老庄思想“在儒道边际思想上脱胎换骨,都总结到儒家思想方面”呢?那要看对“总结”作何理解。《要略》说得不错,《泰族训》只是在“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归于一本,以经纬治道”<sup>[1]2129</sup>。上文已经言及,治道至广,儒家有儒家推崇的治道,道家有道家主张的治道,决非“仁义礼乐”四个字就可以涵盖。但即便是在“经纬治道”上,《泰族训》也只是让各家思想“平流竞进”,并未曾涉及儒、道两家的治道孰优孰劣的问题。在“经纬治道”上,《泰族训》既未扬儒,也未抑道,而是两存其美。因而,不能由于关心治道是儒道两家思想重叠之处,《泰族训》可能出自儒生之手,就断言《泰族训》的主题,乃在要“使全书的道家思想,在儒道两家的边际思想上脱胎换骨,都总结到儒家思想方面”。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家思想,应归于儒家思想之下”的“无形表示”了。

不过,《泰族训》确实是《淮南子》二十篇中儒家思想表现得最集中、最突出者。从《泰族训》中,能发现两个问题:(1)《泰族训》回荡着一种博大之气。在论及“经纬治道”时,不仅对于儒家之孟、荀、“易”(《易传》)、“庸”(《中庸》)兼收并蓄;而且于“群道众妙”,也有“萃”必聚。在“纪纲王事”上,表现出一种本书称之为“不仅能得同体之善,而且能知异量之美”的襟怀。“独尊儒术”前儒生表现出的这种襟怀,和“独尊儒术”之后,五经博士表现出的只认“师法”“家法”,既不见异量之美又不容同体之善的唯我独尊,形成鲜明的对照。《泰族训》这种“经古今之道,总万方之指”“群道众妙”有“萃”必聚的追求,体现着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被李泽厚、刘纲纪从美学上描述为“一种对认识、掌握和占有广大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以及从中所体验到的欢乐感、自豪感。”<sup>[3]434</sup>(2)《泰族训》中跃动着一种雄心:让群道众妙都来“经纬治道,纲纪王事”。不过,走的决不是一家独霸,百家景从的路子;而是采取平调儒、道,广容百家,有“萃”必聚的方针。

## 结语

《淮南子》以《原道训》始,以《泰族训》终。《原道训》及其以下篇章,全力弘“道”。从《繆称训》开始,《淮南子》的言说重心,渐次从道家思想转向儒家思想,至《泰族训》达到极致。不管《淮南子》作者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样的形式结构在客观上无形中预示了汉家意识形态将要发生的由崇尚道家思想到独尊儒家思想的潜在承转。在这个潜在的承转中,实际上也凸显出了儒道两家思想之间固存而难化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尽管在《繆称训》及《修务训》《泰族训》等篇章中,可以明显发现儒家思想的痕迹,但是从《淮南子》整个文本的结构和内容上来看,《淮南子》对于儒学的态度,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从道家的立场出发,对于儒家的批评和攻击。主要反对的是儒家的礼乐制度对于自然纯朴的人情人性的压制和侵蚀。如“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僵,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sup>[1]216</sup>也有对儒家思想进行道家化的改造,从而承认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的积极意义。“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

足修也。”<sup>[1]820</sup>还有对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称颂,以及把儒家之思想偷偷注入道家的躯壳之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泰族训》中汉初儒家思想之基本面貌的大展示大集结。

作为独立而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儒道两家在宇宙论、社会论和人生论诸方面,分别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两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存在有互相接合的可能性;但在更多方面,却大相径庭,属于离之则双美,混之则两伤。《淮南子》从道家出发,最后却又转向于儒,企图“鱼与熊掌”同时兼得。于是在其整个论述中,必然会面临着许多理论上的冲突和融通上的困惑。《淮南子》的作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理论冲突,并试图借助于儒道之间某些论域叠合之处,力图消弭彼此之间的界限,实现理论的融合贯通。当然,这种努力不徒体现在《淮南子》之中,在整个西汉前期的文化选择过程之中,这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1]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3]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Re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in *Huainanzi*: Focusing on *Taizuxun*

WANG Xiao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Huainanzi* has an attitude change from “arrogance” to “respect” towards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Taizuxun*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Confucianism, but on the issue of “administering principle”, there doesn't exist the complete change of Taoism in the marginal idea of both and the “summary” of Confucianism. It mediates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y way of “going forward together” and “satisfying both sid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both sides. This potential hardship change also highlights the internal conflict of *Huainanzi*'s thought.

**Key words:** *Huainanzi*; Confucianist; *Taizuxun*; Taoist; reevalu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